



元代文学
系列丛书


元代文人心态史

徐子方 著

定武舊帖在人間者如晨星矣此又
舊一若昭明尚存元貞元年夏六月佛
釋歸吳興韓亮因翰以此卷為足正
為鑒之知石中真日中實人趙孟頫書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元代文学
系列丛书

元代文人心态史

徐子方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代文人心态史 / 徐子方著.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5.11

(元代文学系列丛书)

ISBN 978-7-201-09946-0

I. ①元… II. ①徐… III. ①文人-心理状态-研究-中国-元代 IV. ①K825.6②I209.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2235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710 × 1000 毫米 16 开本 15.75 印张 2 插页

字 数:300 千字

定 价:58.00 元

引 言

公元13世纪元帝国的建立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事件。来自漠北草原的铁骑旋风般席卷中原大地，标志着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少数民族掌握了全国政权，延续数千年的华夏正统文明首次遇到强有力的挑战。

回顾历史，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古代中国虽然一直未能摆脱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从猥狁到匈奴再到鲜卑等始终不断，甚至还出现了诸如五胡十六国、西夏、辽、金等与汉族统治相对峙的少数民族政权，但那毕竟是短暂的和局部性的。汉民族大抵还能维持一个足以支撑门面的正统王朝，起码也还有着如东晋、南宋那样凭依抗衡或作为心理依托之偏安政权。然而这一切都随着蒙元帝国的军事胜利而彻底改变了。对于传统上以中华文明正统自居的汉族文人来说，心理上不能不感受到强烈的悲剧性。

严格地讲，中国自来不是单一民族的国家，汉族文人亦非中国文人的代名词，同样亦非元代文人的同义语。更为重要的是，元王朝的统治并不始于灭宋统一之后。一部《元史》是以元太祖成吉思汗为开端的，至少在公元13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先后灭亡西夏和金，进而入主中原以后，蒙古帝国即已开始了文治的进程。一批归附的北方汉族文士以及汉化了的女真、契丹、党项族士大夫成了早期元代文人的代表。至于数十年后的南北统一，对于蒙元统治者来说，不过是原统治区域的扩大而已。当然，兼有南方和北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多重特点的元代文人群体至此基本形成，这同样不应被忽视。但唯其如此，我们就不能忘记地域和民族的因素，将元代文人仅定位于汉族文人，甚至仅局限在原南宋统治地域的汉族文人身上，而应涉猎传统元史学已经开辟的所有范畴，将元人心态史看作自蒙古贵族入主中原直到被推翻退回漠北为止的一个完整时代的文人的心路历程。这也符合心态史首先是史，应具备史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的基本要求。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以下的分析中，拟结合社会历史条件，以灭金

(1234)、灭宋(1279)和仁宗重开科举(1315)为契机,将元代文人心态史分为三个发展时期,其中第三个时期的划分主要突出了与文人命运和心态密切相关的课题特征。

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心态史毕竟不同于通史,也不同于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等专门性学科史。对于本书而言,它以揭示元代文人心态的发展为主要任务,所以心理学有关研究成果的理解和应用自然也成了本书内容的重要方面,诸如挫折理论、需求理论以及文化学中的挑战应战理论等。不难看出,正是这些理论构成了我们把握各不同时期文人心态特征的思想基础。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心态史亦并非心理学史。我们准备建构心理学理论,甚至也没有在建构心态史学理论方面花费过多的精力,因为它超出了本书所要完成的任务范围。本书不采取用历史资料去印证心理学理论等简单的比附办法,而只是把有关理论化为研究的指导原则。我们的目光从来没有离开丰富多彩的元代文人生活,其结论表述甚至某些推理方式亦更接近于传统,接近于所要勾画的那个时代。这样做也许不那么时髦,但迈出去的将是实实在在的脚步。

我们将以这样的脚步走下去。

CONTENTS

目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冲击与挫折:来自漠北的挑战(上)	1
一、天崩地解	1
二、折挫斯文	9
第二章 用夏变夷	22
一、耶律楚材:先驱者、孤独者	23
二、后来者:金莲川儒臣群体心态	33
三、与道共进退——许衡个案分析	47
第三章 挑战传统	61
一、散淡谐虐,名士心曲	61
二、悲喜皆空幻——白朴及其心态	71
三、浪子·斗士·大师 ——关汉卿的心态特征	84
第四章 一统与分化:来自漠北的挑战(中)	97
一、一统天下与统一人心	97
二、“夷俗”残余与等级分治	108

元代文人心态史

第五章 北人再抉择	120
一、心系修齐治平的人们	121
二、不召之臣——刘因心影录	131
三、“曲状元”——马致远心态剖析	138
第六章 南人之烦恼	146
一、烦恼众生相	147
二、“精神贵族”——赵孟頫的痛苦	159
第七章 希望与幻灭：来自漠北的挑战(下)	168
一、汉法与科举：文人希望所在	169
二、种族特权——希望及幻灭因果	176
第八章 追求盛世归宿	184
一、盛世南官——二重性心态结构	184
二、挣扎在传统和现实之间	193
三、趋向汉化——来自异域的心声	203
第九章 群体大裂变	214
一、恪守臣民本分	215
二、看破世情归隐	224
三、迎接新王朝	234
参考文献	243
后记	247

第一章 冲击与挫折:来自漠北的挑战(上)

漠北,古代中国泛称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的地区。最早明确见于史籍《三国志·魏志·明帝纪》:青龙元年“(步度根)与(轲)比能合寇边,遣骑将军秦朗将中军讨之,虏乃走漠北”。然自此以后,在中原人的心目中,漠北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甚至成了遥远、荒凉的代名词,连本身即为北方“夷狄”的契丹、女真、党项诸族皆不屑顾及。

然而历史发展到了公元13世纪,这块长期以来被世人遗忘了的土地一下子成了全世界瞩目的中心。崛起于这里的蒙古军事贵族,凭借着“塞北雕弓硬”的武力优势,在短短数十年内摧垮和蹂躏了周围比它先进得多的文明实体,成为横跨欧亚两洲广袤地域的主宰者。面对这一空前壮观亦空前残酷的武力征服,自命为代表华夏文明正统的中原儒家文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剧烈冲击,文化的危机感和生存威胁的恐惧作为他们心态的主要表象,和整个蒙古帝国内不同文化剧烈重构的趋势无疑是合拍的。所不同的是,由于独具历史重负,又处于蒙古大汗统治的“腹里”,作为元帝国直接控制下的臣民,中原儒家文人士大夫所受冲击的程度以及由此导致的群体挫折意识亦更深入了一层。正是对这种冲击和挑战所进行的反应乃至应战,构成了此时期文人心态的主要特征。

一、天崩地解

天,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既指自然界的苍穹,更指主宰众生命运的统治者,不过稍加变通,称为“天子”而确定其在人间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已。传统儒家自汉代董仲舒开始,即把上天意志和人间帝王联系在一起,结合古老的信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创造了以纲常伦理为主导

的思想文化体系。君臣、父子、夫妻三组关系被作为维系国家、宗族、家庭正常秩序的纽带；仁、义、礼、智、信五个道德标准亦成了人们心目中理想人格的楷模。天崩地解，即人们常说的天子蒙难、社稷倾覆、纲常倒置、道德沦丧，对于中原汉族文人士大夫来说，是如丧考妣的大不幸事。

早在蒙古贵族入主中原之前，中国北方已经过了数百年的异族统治，这就是先后由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契丹族建立的辽和女真族建立的金。但总的说来，它们的统治后期都相继实行汉法，逐渐汉化，并最终融入了中原古老文明，取得了广大汉族文人士大夫的认同，承认了其君临天下的资格和地位。在此基础上，北方文人，加上汉化程度较高的少数民族士大夫在内心重新建构了纲常伦理体系，群体找到了新的平衡点。然而在蒙古军队摧枯拉朽般的武力开进面前，这一切再一次受到了血与火、灵与肉的洗礼。

（一）帝后蒙难，忠臣授首

在传统文人士大夫心目中，宗庙和社稷是一切纲常伦理的基石，而作为国家象征的君王后妃更是臣民精神寄托之所在，正因为如此，公元1234年，即蒙古窝阔台汗（元太宗）六年、金哀宗天兴三年正月初十日，是北方文人士大夫难以忘怀的日子。在历经三个月的围城苦战之后，金朝临时首都蔡州陷落，末代皇帝完颜守绪自缢而死。死前一日，这位皇帝痛心疾首地对侍臣说：

我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无大过恶，死无恨矣。所恨者祖宗传祚百年，至我而绝，与自古荒淫暴乱之君等为亡国，独此为介耳。^①

实事求是地说，哀宗并非天生的亡国之君，在位十年，多次采取措施，任用有功将帅，激励人心，抗蒙救亡，但金廷已弊政百出，病入膏肓，无可救药。诚如《金史》所言：“世无足为者。”尽管如此，他在最后还试图作一点努力，以使宗社不亡在自己手上，当夜传帝位给东面元帅、宗室完颜承麟。承麟固让，诏曰：“朕所以付卿者岂得已哉。以肌体肥重，不便鞍马驰突。卿平日矫捷有将

^①《金史·哀宗下》。

略,万一得免,祚胤不绝,此朕志也。”说到底,他还是不愿亲见亡国惨剧收场而已。其实他心里也清楚这不过是掩耳盗铃,当城破巷战时,即绝望自缢。“末帝(承麟)退保子城,闻帝崩,率群臣入哭,谥曰哀宗。哭奠未毕,城溃……末帝为乱兵所害,金亡。”^①

“天子”如此,亡国后妃命运亦并好不到哪儿。此前两年,哀宗自汴京出奔,而把皇太后、皇后和诸妃留在汴京,以安定城中人心。不及二月,留守汴京的金西面元帅崔立发动政变,杀在城金廷宰相及其他留汴官员,投降蒙军速不台部。速不台入汴后杀荆王守纯、梁王从恪,将金太后王氏(温敦氏)、皇后徒单氏及诸妃押往蒙古,竟不知所终。惟宫人宝符李氏从至宣德州,自缢于佛殿,且自书门纸曰:“宝符御侍此处身故。”作为母仪天下的金王朝后妃竟以这种形式为金王朝画上了屈辱的句号。金末诗人麻革后来追忆这段家国惨变时,有诗悲叹:“北极长虹掣,西垣太白高。千年知运圯,四海共兵麇。……江山留惨黯,天地入君蒿。”^②麻革一生未在金廷做官,本为局外之人,但帝死后辱仍在他心目中激起巨澜,以至“四海”“江山”“天地”皆为之动容,真正是天崩地解了。“知运圯”一句显示了文人之万般无奈。

当然,麻革所吟还是事后追忆,所以能得细细回味,并在丧痛之余以气数命运自我宽解。曾食金禄的元好问在当时的悲叹就没有这样的从容了,其《甲午除夜》一诗写道:“暗中人事忽推迁,坐守寒灰望复然。已恨太官余糲饼,争教汉水入胶船?神功圣德三千牍,大定明昌五十年。甲子两周今日尽,空将衰泪洒吴天。”^③“甲午”即公元1234年,正是金哀宗身殉社稷之年。元好问为金兴定三年(1219)进士,累官南阳令、尚书省员外郎,哀宗天兴初入翰林知制诰,自感救时无方,唯有洒下一掬衰泪。“坐守寒灰望复然(燃)”,只是一个幻想而已。

最使遗民文人扼腕悲叹的是,一批志在救亡图存的金廷忠臣很少成功,皆相继败亡。如曾在大昌原(今属陕西)、卫州(今属山西)率军屡败蒙古大兵的完颜陈和尚,在钧州三峰山之战中由于金廷指挥不力而被擒,蒙古将领“欲其

①《金史·哀宗下》。

②(金)麻革:《貽溪集·上云内帅贾君》,顾嗣立编:《元诗选》三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页。

③(金)元好问:《元好问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9页。

降，斫足胫折不为屈，豁口吻至耳，嚔血而呼，至死不绝”^①。又如蒙古军队攻陷金中京(洛阳)，同样曾经屡次打败蒙军的金守将强伸亦战败遭擒。战胜者将他强拥在马上，说：“你能北面一屈膝，就饶你的命。”强伸不从。蒙古兵强迫他向北(北面即表示降伏)，强伸扭头南向，终不屈被杀。最为惨烈的是完颜仲德，他原为徐州行尚书省事，哀宗在汴，诏命各地入援，多观望不进，唯仲德领兵千人“间关百死至汴”，后又随同奔蔡，“领省院，事无巨细率亲为之”。他头脑清醒，理政有方，殚精竭虑以图振作，但终因国事糜烂，无从收拾而一事无成。哀宗自缢后，他亦心力交瘁。《金史》本传记载：

仲德率精兵一千巷战，自卯及巳，俄见子城火起，闻上(哀宗)自缢，谓将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战为？吾不能死于乱兵之手，吾赴汝水，从吾君矣。诸君其善为计。”言讫，赴水死。将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辈独不能耶？”于是参政李术鲁娄室、兀林答胡士，总帅元志，元帅王山儿、纥石烈柏焘、乌古论桓端及军士五百余人，皆从死焉。

史称金室“南渡以后，将相文武，忠亮始终无瑕，仲德一人而已”^②。如此忠臣贤材，一力匡扶社稷，却终致身殉，真正是一木难支大厦！

不仅如此，即使在金亡之后，仍有不屈殉节之士，这方面最著名的是巩州(今甘肃陇西)守将郭虾蟆孤城拒战。郭虾蟆，会州(今属甘肃)人，以功授巩州兵马都总管、元帅左都监。他坚守孤城近三年，元太宗八年(1236)，蒙军并力攻城。郭虾蟆日与血战，力抗蒙军，因寡不敌众而城破，与部下誓死不降。《金史》本传这样记载：“鏖战既久，士卒有弓尽矢绝者，挺身入火中。虾蟆独上大草堆，以门扉自蔽，发二三百矢无不中者，矢尽，投弓剑于火，自焚，城中无一人肯降者。”这就为金王朝的灭亡，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悲壮的告别乐章。

君主死国、后妃受辱、忠臣授首、义士扼腕，对于亲身经历过如此巨变的中原人士大夫来说，用“天崩地解”形容绝不过分。刚刚建立不久的纲常伦理体系又被打破，刚刚稳定的心态一下子又失去了平衡，情感的震荡可想而知。

①《金史·忠义传》。

②《金史·完颜仲德传》。

知。正如身为金遗民的元好问《四哀诗》所吟诵的：“赤县神州坐陆沉，金汤非粟祸侵寻。当官避事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重围急变纷纷口，九地忠魂耿耿胸。”^①这是对那些亡国忠臣的赞颂，其中也有着国破家亡的悲怆。而在悲怆之余，亡国忠臣对眼前近乎荒诞的现实竟产生了虚幻的感觉。如杜瑛的《秋思》：“铜驼巷陌周东土，金凤楼台邺北城。千古繁华俱一梦，空余草木战风声。”^②杜瑛亦为金之遗民，亡国后多次拒绝元王朝的征聘，死后遗命其子曰：“我死，棺中只置《杜甫诗集》一编，题其志石云：‘处土杜瑛山墓’。”可见亲身经历亡金天崩地解般惨祸对他心态的影响。在《邺南城》一诗中作者写道：“陆地百年沧海变，西陵千古暮云长。呜呜敕勒平川水，寒绕阴山恨未忘。”^③充溢在字里行间的依旧是国破家亡的遗恨，尽管写此诗时金亡已经多年，作者虽未做官，也已食了“周粟”。

如前所述，由于在中原文人士大夫心目中，此前已重建了纲常伦理体系，故上述金遗民虽皆为汉人儒士，但女真帝后及社稷崩沮倾覆同样牵动着他们的心。即如曾任亡金河东山西道行中书省参议的陈赓在《宣宗挽词》诗中所表白：“洛邑周初定，苍梧舜不还。九天来鹤驭，万国泣龙颜。”^④这同样可以用来形容金亡时帝妃蒙难、忠臣授首在中原文人士大夫心目中产生的反响。

由此尚可进一步推想的是，由于同样在统治后期实行了“汉法”治理和民族融合之政策，在金亡以前即已上演过君亡国灭惨剧的辽和西夏遗民心目中，必然也产生过类似的情感反应。虽然由于留存资料有限，难以对他们的心态进行过细的分析，但从耶律楚材（契丹）、李楨（党项）、高智耀、廉希宪等人入元后的心态及表现看，他们所建立的纲常伦理思想体系与上述亡金遗民并无二致。在他们的潜意识中隐藏着早年国破主辱的记忆，是他们参与文化反征服行动的心理基础。当然，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已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

（二）邦家未造，五伦遭蹙

“未造”及末世，古人常以指衰亡时期。“五伦”则是为世人熟知的五种传

①（金）元好问：《元好问全集》卷9，排印本第247页。

②（金）杜瑛：《瑛山集》，顾嗣立编：《元诗选》3集，中华书局1987年排印本，第42页。

③（金）杜瑛：《瑛山集》，顾嗣立编：《元诗选》3集，中华书局1987年排印本，第42页。

④（元）陈赓：《子颺集·宣宗挽词》，顾嗣立编：《元诗选》3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7页。

统的社会关系准则，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关系及其处理原则，它们构成了儒家伦理文化的核心。元帝国建立过程中，这种以伦理为核心的文明受到了带有原始气息的漠北游牧习俗的强力冲击，其对中原文人士大夫心态震撼的程度，可以说并不亚于国破主亡、忠奸倒置所造成的心灵冲击。这种冲击在这一时期集中体现在名节观方面。

众所周知，名节观是儒家伦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涉及范围，大至君臣，小至夫妇。对前者而言，名节，一作臣节，乃忠贞和气节的代名词。上述完颜仲德、陈和尚、郭虾蟆等殉国士大夫表现的即为对君主和对国家的忠，维护的即为视若生命甚至较生命更加重要的名节。根据古代中国特有的家国同构观念，这种名节观无疑亦适用于构成社会细胞的家庭，最集中地体现为妇女的贞操观。宋儒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今天看来未免陈腐，但在当时却多少反映了人们心中存在的集体无意识。不仅自命为华夏正統的南宋统治区域，即使在北方汉化已久的原西夏、辽、金统治地带，从文人士大夫到普通老百姓皆程度不等地信奉着这一道德准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元曲大家白朴。

“千古神州，一旦陆沉，高岸深谷。梦中鸡犬新丰，眼底姑苏麋鹿。”这是白朴《石州慢》词上阕开首两句话，真实地道出了历经国破家亡惨剧的作者心目中邦家末造的意象。据记载，白朴七岁时适逢壬辰之乱（1232）。这一年，蒙古军队进攻汴京，哀宗出奔。不久发生崔立政变降蒙事件，汴城失陷。身为金枢密院判的白朴父亲白华先随驾后亡宋，其母为蒙军所掳，或死或辱，从此再无音信。若无父亲的好友元好问仗义收养，并携之逃难，年幼的白朴命运可想而知。虽然数年后终得与父亲重逢，但失母的哀痛却始终萦绕在白朴的心头。时人王博文后来为白朴词集《天籁集》作序，序中称其“自是不茹荤血，人问其故，曰：俟见吾亲则如初”^①。可见这次人伦惨变在白朴心头留下印迹之深刻，至不可磨灭。王序又称白朴“幼经丧乱，仓皇失母，便有山川满目之叹。逮亡国，恒郁郁不乐”，则更将个人家庭不幸和国家民族的灾难紧密联系在一起。邦家末造和天伦惨变此时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也就是生身母亲遭掳给白朴心灵造成长期伤害，以至改变其人生选择的重要原因。关于后一点，我

^①（元）王博文：《天籁集序》，《四库全书》集部10“词曲类”。

们在以后的有关章节中还将系统论述。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蒙古贵族入主中原之初,遭逢这种天伦惨变的中原文人士大夫并非白朴一人。生活在元代早期的北方儒士刘因即明确地记述:“金崇庆末,河朔大乱,凡二十余年,数千里间,人民杀戮几尽。其存者以户口计,百不一余。”^①如此杀戮自然包括纲常伦理之破坏。其《翟节妇诗序》又谓:“昔金源氏之南迁也,河朔土崩,天理荡然,人纪为之大扰,谁复维持之者?”^②也许正由于亲身经历了这种世事末造和纲常惨变,导致了刘因后来屡拒新王朝征召之不合作态度,强调“非如此,则道不尊”。当然,这也是后话了。

平心而论,蒙古统治者并非天生的逆伦悖理者,和历史上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一样,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他们也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伦理道德规范。只是由于漠北和内地的文化传统不同,故其价值取舍标准及表现形态亦各相异,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征服者”蒙古军事贵族不愿意尊重“被征服者”内地士民的伦理道德传统。另外,也由于文明发展程度客观上有着先进和落后之别,草原游牧民族带有较多的原始气息,与严谨规范的中原农耕民族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差异本身即意味着矛盾。《论语》记孔子称“夷狄之有君,不若诸夏之亡(无)也”(《八佾第三》),此为尽人皆知的观点,是说边远少数民族即使有国君管理,也不如中原汉地什么都没有的好。表面看似似乎并无特别的刺激性,但在古代中国宗法社会里,国君即为天下父,“天、地、君、亲、师”亦为五常,缺一不可。孟子解释说:“无父无君是禽兽”(《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这也是后世人们常挂在嘴边的话,也作为一种观念深深扎根在人们的心中。孔子的话实际上即可理解为少数民族“夷狄”甚至不如汉族“无父无君”之禽兽,可见鄙夷之深。然而鄙弃的另一面却又是莫名的恐惧。同样是孔子,《论语·宪问》曾记载他有一次评论称:“微(无)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汉人马融解释说,孔子的意思是假如没有管仲辅佐齐桓公尊王称霸,即“君不君、臣不臣,皆为夷狄”。^③孟子又云:“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④

① (元)刘因:《武强尉孙君墓志铭》,《静修先生文集》卷4,中华书局1985年排印本,第75页。

② (元)刘因:《静修先生文集》卷6,中华书局1985年排印本,第105页。

③ 《论语注疏》卷14,《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512页。

④ 《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变于夷”，最主要的标志即为纲常伦理的颠倒：“君不君，臣不臣。”也包括礼俗的根本改变，“被发左衽”即为夷俗。堂堂华夏，改行夷俗，在儒家文人士大夫看来自然是极其可怕的事。这种心态的源头自然来自孔子的恐惧。从深层角度看，实际上亦即是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互相冲击的心理作用。历史上这种心态的表现有所不同，有的经过一番曲折之后予以认同，如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类，更多的是尽可能地排斥和抵制，即使限于客观情势所逼不得不“随俗”，亦充满了屈辱感。如汉时王昭君远嫁匈奴成为单于的阏氏，老单于亡故后又“奉诏从俗”而改嫁前妻子等等。这种紊乱伦常的夷俗至元代仍未消失。郑思肖《心史·大义略叙》中明确记载：“父死，子皆得全袭父妻为已妻，惟正妻与生子者不可。”

对于已被蒙古武力征服的广大汉族文人士大夫来说，这种被迫改从夷俗的屈辱还不是整个纲常惨变的全部，更多的是被征服遭蹂躏的悲哀。时人徐大淖有过这样的一段记载：

鼎革后，编二十家为甲，以北人（蒙古、色目）为甲主，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自尽者又不知凡几。金芸楼室人周氏花烛之夕，甲主踞之，周以熨斗破其脑，亦自经死。芸楼惧祸，缢其旁。^①

这实际上极其类似于欧洲中世纪对被征服民族施行的野蛮的初夜权，极有可能是蒙古贵族入侵欧洲过程中知悉和模仿的结果。虽然徐大淖是由宋入元之人，所记乃灭宋后江南之事，但无疑沿自蒙古人主中原以后。历史上，诸多汉文史籍记载“夷狄”尊崇华夏礼乐制度，以至于为之感化而尽弃本俗。从北朝元魏直到辽、金之“汉法”，无疑证明了这种洋洋自得之记载亦并非纯然虚夸。而蒙元帝国的建立，第一次使得汉族文士的整体自豪感化为乌有。徐大

^①（元）徐大淖：《烬余录》乙编。《烬余录》是一部元代历史著作，2卷，为南宋苏州城北遗民徐大淖所著，被保存在一部装裱得极精致的书画册页里，一直到清朝末年（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才由李模从金陵徐绍斋处抄录出来。其中甲编记述宋代的遗闻轶事。乙编所记述大半是金元两朝迭次给予苏州人民的暴行虐政，和宋元绝续之交蒙古军队对汉人的奸淫杀掠惨状。虽多实录，但因为太直白，足以惊世骇俗，有学者因而怀疑该书为清末反满人士所伪托，但并无直接证据。

淖记载以及前述白朴、刘因之经历皆不过较具代表性而已。时人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中则更直陈：“国家(指元朝)承大乱之后，天纲绝，地轴折。所谓更造夫妇，肇有父子者，信有之矣。”^①如前所言，蒙古统治者并非丝毫不顾及夫妇、父子的天伦大理，而是通过武力征服破坏中原汉人的夫妇、父子关系，客观上造成“更造”“肇有”的纲常惨变后果。时人吴弘道散曲《醉高歌·叹世》如此悲叹：“风尘塞外飞沙，日月窗间过马。风俗扫地伤王化，谁正人伦大雅？”^②“风俗扫地”非别，乃汉族文人士大夫引以自豪的中原礼俗斯文扫地，“王道”屈从于“霸道”。其实何止是有伤“王化”，直是“天纲折，地维绝”的根本性巨变，与前不久还呈现华夏文明盛况的宋代又成了鲜明的对照。直到元末明初宋濂还对此感慨颇深：“元有天下已久，宋之遗俗变且尽矣。”^③南宋遗民谢枋得更有资格对比品味这种惨变的痛苦，他入元后不久即惊呼：“嗟呼！夷而灭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国有天地以来无此变也。”^④

应当说，谢枋得并非拘于一家一姓天下之愚忠者，他在《上丞相留忠斋书》中这样说：“君臣以义合者也。合则就，不合则去。”显示了少有的开明。他的惊叹也超越了普通的改朝换代，而升华到两种文化传统矛盾冲击的高度，与前述孔子的鄙夷和恐惧，前后出自一个思想脉络。简而言之，这是面临自身文明受到强力挑战，感受到灭顶之灾时发出的悲鸣，是灵与肉的冲击和呐喊。在这种悲鸣和呐喊后面，站着整整一代恐惧不安的文人。

二、折挫斯文

文化史研究表明，不同文明之间的冲击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在文化的载体之间。公元13世纪，中国境内由蒙元帝国崛起而导致草原游牧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之间的剧烈矛盾，即具体化为所向披靡的蒙古铁骑和饱读诗书但手无缚鸡之力的汉族儒士之间的冲突。表面上看这似乎有点滑稽，正所谓“秀才见

① (元)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卷5《中书耶律文正王》。

② 隋树森辑：《全元散曲》(上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32页。

③ (明)宋濂：《文宪集·汪先生墓志铭》，《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所收本(以下简称摘藻堂四库荟要本)。

④ (宋)谢枋得：《叠山集·送黄六有归三山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本(以下简称四库本)。

了兵”，然事实上亦的确如此。草原游牧文明的传播工具非别，正在于金戈铁马攻城略地，而中原农耕文明也正是以儒家文人为传播载体而得以扩展延续的。不难看出，传播载体的巨大差异和物质力量的不成比例，从一开始即注定了这两种文明冲突之不对等性，虽然总体趋势是进入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在文化上逐渐向先进的汉族靠拢，亦即自觉不自觉地“汉化”，但冲突伊始，前者对后者的武力摧残则是显而易见的。元无名氏散曲《朝天子·感志》指出这种摧残的结果是“贤和愚无分辨，折挫英雄，消磨良善，越聪明越运蹇”^①。今天看来，在这样的武力摧残面前，“折挫”的不仅是英雄，更多的是一代够不上英雄但却不失“良善”和“聪明”的普通读书人，是民族之斯文。

（一）传统优势及其失落

元代以前的中原文人，虽然在个别时期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中遭受磨难，大多数则处于天生优越之地位。“儒为席上珍”，这句熟语虽不无夸饰，却大抵道出了传统儒士的自得心理，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是被元王朝取代的赵宋。

稍具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宋代基本国策便是重文轻武，较之武人，宋王朝对文人的待遇要优厚得多。宋太祖赵匡胤曾说宰相须用读书人，其实何止宰相，就是掌兵的枢密使，下至州郡长官，亦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文人，是典型的文官政治。宋代文人如欧阳修、王安石等既为政界大员又为学界或文坛盟主之双重身份，不但前代李白、杜甫等人难以比肩，元代关汉卿、马致远等更是难望项背。

不仅如此，宋代文化教育还特别发达。一方面在学校制度上等级差别缩小，如官学向宗学转化后不分亲疏，国子学向太学转化后无问门第，这种变化无疑有利于低级官员子弟乃至寒庶文士脱颖而出。唐及以前的士庶之争以至“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之等级不公平局面不再出现。另一方面是重视发展地方学校，设置学官教授，并有一连串考试提升的办法。此外还有民间私立书院，如著名的庐山白鹿洞书院、南京应天府书院、潭州岳麓书院、衡州石鼓书院等等。《宋史·选举志》称当时“学校之设遍天下”，当不为虚夸。

^① 隋树森辑：《全元散曲》（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688页。